

那青涩与幸福的时光

——“情语——丰子恺《护生画集》真迹展”特别报道

(根据钱江晚报报道整理 记者 林梢青 实习生 付玉婷)

《护生画集》最终栖身浙博,冥冥中似有召唤。因为丰子恺说:“西湖于我,可谓第二故乡。”在漫长的艺术岁月里,杭州的点点滴滴,时时穿过丰子恺手中细细的毛笔,停留在那一幅幅小小的画面中。

这息息相通的情味,从少年求学杭州开始。国文老师偏爱这位名叫“丰仁”的好学生,为他改名“丰子恺”,愿他“和乐”、“安宁”。他与杭州共度的每一段时光,都围绕着这份幸福感——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(现在的杭州市高级中学),他结缘恩师李叔同,确立绘画之志;

在西湖“行宫”,他静观春秋美景,滋养笔墨光华;

在“湖畔小屋”,他享受盛名岁月,与知己宾朋分享美酒与时光。

读《护生画集》之前,我们打开丰子恺的杭州记忆,以此感受这座城市丰盈他笔端的善与美。

第一处:凤起路238号,杭州高级中学【起】·选择

《护生画集》,缘起丰子恺与恩师李叔同的师生之情,如今位于凤起路上的杭州市高级中学(以下简称“杭高”),则是他们结缘的亲见者。

四月底的午后,已有初夏味道。百年校园杭州高级中学里,绿草茵茵,梧桐水杉错落参天,红墙灰瓦一如当年。

校史馆的旧相片里,一头板寸的清秀少年还在,一身挺拔的立领中山装,眉眼低低的青涩。在他身旁,是李叔同、夏丏尊、姜丹书等众多名师的泛黄模样。

仿佛,就是99年前那个夏天的午后,17岁的丰子恺,只身远离故乡桐乡石门镇,背着简单的行囊,以第三名的成绩,走进了彼时还叫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杭高。一入学,就受老师们格外偏爱。

国文老师单不厂,给原名“丰仁”的他,取了号“子恺”,“恺”,意为“和乐”与“安宁”,而他看起来也的确很像这个新名字描绘的那样。艺术老师姜丹书逢人便夸这位面庞儿天生团团的孩子,行为举止循规蹈矩,不苟言笑,很有大人样。

倒是那位叫李叔同的音乐老师,寡言少语,从不轻易夸他,甚至令他有点害怕。

但正是这位老师,后来点亮他的绘画之光,他的人生从此不同。而《护生画集》也正因此这段缘分而起。

这几乎是杭高最脍炙人口的佳话。

【承】·琴

漫步古朴苍郁的校园中,90后孩子们色彩斑斓的画儿正在展出,音乐教室里传来孩子们悠扬的合唱声。

恍惚正是丰子恺笔下的校园——“学校里

有开天窗的专用图画教室;音乐教室单独坐落在校园花丛中,拥有两架钢琴,五六十架风琴。”“下午四时以后,满校都是琴声,图画教室里不断地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,光景宛如一艺术篆刻学校。”

轻轻推开音乐教室的门,如同推开丰子恺的第一堂音乐课,那样紧张而彷徨——在那里,他第一次见到了东瀛留学归来的名师李叔同。

“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。以为先生还没有到而嘴里随便唱着、喊着,或笑着、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,吃惊更是不小。他们的唱声、喊声、笑声、骂声以门槛为界而忽然消灭。接着是低着头、红着脸、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。”

丰子恺悄悄打量这位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的名师,早在13岁那年,他就在故乡的小学里唱过他写的《祖国歌》,“李先生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,露出在讲桌上,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,细长的凤眼,隆正的鼻梁,形成威严的表情。这副相貌,用“温而厉”三个字来描写,大概差不多了。”

和所有的同学一样,在这样的老师面前,他有些怯怯,练琴自然不敢松懈。

“每弹错了一处,李先生回头向我一看。我对于这一看比什么都害怕……我当时实在怕见李先生的一顾,总是预先练得很熟,然后到他面前去弹琴。”

【转】·画

透过画室天窗,阳光披在石膏模型上,今天的孩子们,对这一幕已习以为常。但在那样一个时代,接受这些,很需要些远见与勇气。

当李叔同第一次在教室里打开天窗,放上三角画架,摆起石膏像,教学生们用木炭画西洋画儿时,习惯了临摹的孩子们竟然无从着手,没一个画得像样。

但丰子恺却被拨动了心弦,觉得眼前的世界突然多了变幻,“天生的云,墙上的苔痕,桌上的器物,别人的脸孔,我的心会跟了这种线条和浓度之度而活动,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情趣。”

老师们发现,这位昔日乖巧的孩子,眼里多了些坚定与叛逆。他逐渐疏远了其他科目,借故请假到西湖边写生。杭高离西湖不远,没有地铁,没有公共自行车、没有出租,他总是步行前去,很快成了学校里绘画成绩的佼佼者,还被推为学校“桐荫画会”的负责人。

一天晚上,他到李叔同的房里去汇报学习情况,正要退出时,李叔同用很轻但极严肃的声音对他说:“你的画进步很快!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,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。”

这是如此有力的鼓舞,丰子恺“听到他这两句话,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,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。……这几句话,便确定了我的一生……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,把一生奉献给艺术……”

【合】·展

1919年的5月,丰子恺和“桐荫画会”的朋友们,一起在海路举行了展览,这是他作品的第一次对外展出。他特别邀请了老师过来检阅。而当时的李叔同,已是弘一法师。

师徒之间的细语仍历历在目——

老师说:艺术心,是广大同情心;艺术,是心灵为主,技术为次;艺术教育,应当是温柔敦厚、文质彬彬。



学生沉默点头,将字字句句谨记在心,开始以博爱之心去看天地间一切有情无情的物事。正是这样一对真诚有爱的师徒,86年前,开始有了劝人向善爱善的《护生画集》。

2013年的5月,依然在杭州,我们将看到这部经典之作,体味当年这对师徒的赤子之心。

第二处:皇亲巷6号、马市街156号、田家园3号

告别了杭高的幸福求学时光,15年后,1934年,丰子恺又回到了距离杭高不远的皇亲巷,与当年的孑然一身不同,37岁的丰子恺是带着长女丰陈宝、二女丰宛音、外甥女丰宁馨等,来杭州读书。禁不住对杭州的牵挂,也为了孩子们方便上学,他从皇亲巷6号、马市街156号到田家园3号,几度变迁,戏称西湖“行宫”。

皇亲巷尽头的花园里,一眼便能望见丰子恺的铜像。坐在竹椅上打发时间的老居民们,都知道丰子恺在这里度过的好时光。距离他住过的老宅子“肖圃”被拆,也不过20年辰光。

“前面有一座九曲桥,还有一个八角亭,过来是一个有圆洞门的墙,里面是正房……正房前面还有葡萄园和假山,很漂亮。”老人家的绘声绘色中,好时光随之浮现——

晴好之时,丰子恺定到西湖边走走,他最爱那些嫩嫩的杨柳。“湖岸的杨柳树上,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,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,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S线来,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,非赞它一下不可。”

雨天也有雨天的好。有一次,他与两女孩到山中游玩,忽然下雨,仓皇奔走,在一家小茶店坐下。游山遇雨,最初觉得扫兴,但此时此刻,山色空蒙雨亦奇,那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他的感兴,反而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。

灵感突来,他向门前的茶博士借了一把胡琴,在中小茶店里的雨窗下,从容地拉起了西洋小曲。孩子们和着唱起歌,引得村里的人们都过来看。

一个女孩唱起了《渔光曲》,要丰子恺用胡琴和,他就和起来,青年们都跟着齐唱,一时之间,苦雨荒山添了一份温暖。

清淡却温暖,这样的诗意与人情味,正是丰子恺笔下画面的情味,犹如山中传来的悠悠胡琴声,余韵犹长。

第三处:北山路与葛岭路之间

无论是求学还是生活,抑或是艺术创作,西湖实在是丰子恺生命中无法绕开的情结。

眼前是湖光涟漪、绿意浓浓,一眼望得见对岸的孤山林和靖放鹤亭。天气晴好的时候,天鹤们就在这一带游湖,正是游客们最爱的西湖景致之一。

时光倒回66年,1947年,刚刚经历了10年的逃亡岁月,恰逢他“天下何人不识君”的盛名岁月,求画之客不断。家人相伴,宾朋满座,

丰子恺正是在这片湖光山色中,重新找回了安宁充实的幸福感,画画的意思愈发浓了起来。

老宅早已不再,留下的是四棵静默的法国梧桐,它们如当年一般紧紧牵着圈,像是要牢牢守住记忆。

那时,这里还叫静江路85号。

一租下这小屋,丰子恺便欣喜地给朋友夏宗禹写信:“杭州山水秀美如昔,我走遍中国,觉得杭州住家最好,可惜房子难找。我已租得小屋五间,在西湖边,开门见放鹤亭(孤山林和靖放鹤之处),地点很好,正在修理,大约一个月后可进屋……此屋租修约三百万元,连家具布置,共花五百万左右。上海画展所得,就用空了。”

这一住就是一年半,丰子恺把这里叫做“湖畔小屋”,还和友人章锡琛、叶圣陶等共同酝酿出一对妙联:“门对孤山放鹤亭,居邻葛岭招贤寺”。而马一浮就住在几步之遥的葛岭山庄,两人常在一起谈诗论艺,马一浮还为小屋提了一副篆字对联:“天清”、“地宁”。

画桌上总有未画完的画,有时是别人所求,有时是《护生画集》第三集的作品。画得疲倦了,丰子恺便搁下笔,布履长衫,抚着长长的胡子,带着心爱的猫咪“白象”,惬意漫游湖岸边。看



看各式各样的游人们也是一件快事。有位陌生人常来家门口钓虾,丰子恺看得入迷,一来二往,竟成了朋友。

小屋里总是宾朋满座,丰子恺在院子里存起了好几缸绍兴花雕,常常手执酒杯,和朋友们畅谈至夜幕深沉。这倒是辛苦了丰师母。“我家每日来客人,不下十班。送迎甚苦。宿夜客不断,有时客堂里设行军床。丰师母好像开了包饭作,每天忙于招待酒食。我倒喜欢热闹,来客一概招待。”

这是丰子恺最后一段在杭州的幸福时光。1949年,丰子恺移居上海。

1973年3月26日,经历了长达7年的禁锢生活之后,丰子恺从上海直奔杭州的春天,在一个星期里,重温花港观鱼、三潭印月等地,还写下了数篇诗文。

而那一次,是他与西湖的诀别。

40年后的现在,西湖又一次见到了丰子恺和他的《护生画集》,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。

命途多舛的护生画

《护生画集》是一部奇书,也是丰子恺先生重要的代表作。画集缘起于一九二七年。当年,丰子恺先生在上海江湾的家里,接待弘一法师,也就是著名的李叔同先生。在丰先生生日这天,他以弘一为师,皈依了佛法。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,他们商量由擅长绘画的丰先生作画,由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,共同编写《护生画集》。从1929年弘一五十岁起,每十年作一集,各为50幅,60幅,70幅,80幅,90幅和100幅,与弘一法师年龄同长。弘一法师在世的时候,丰先生先是把它看成送给弘一法师的寿礼;弘一法师圆寂之后,丰先生又把它看成是对弘一法师的怀念。当然,它亦是爱护生灵与心灵的呼吁。

全套共六册的《护生画集》。由丰子恺先生作画;第一、二集的文字为弘一法师题写,第三集为叶恭绰撰写、朱幼兰题写了第四和第六集、虞愚书写第五集。前后相继,创作过程长达四十六年。在佛教界、文艺界和广大普通读者中广泛流传,影响深远。它是佛教界、文艺界诸位先贤、大师们绝世合作的结晶,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。

《护生画集》的最早版本,是1928年2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平装本。但是现在留下来的护

生画第一集原稿并不是最初的版本。根据丰子恺1939年3月5日的日记所写:“曹聚仁(也是杭高校友)扬言欲烧毁之《护生画集》,其原稿一弘一法师所书,我所绘一已在上海佛教工士林中被倭寇所烧毁。弘一法师闭关之后,犹发心重写,是诚众生之福音。吾拟即覆书,请其即着手重写,写成后即由吾依文字重置绘画,设法付刊。”弘一法师重写的书稿,后来保存在大法轮书局一位名叫苏慧轮的居士那里,后来他连同第二集的字画一同捐出,丰子恺随后将第一集50幅画重新绘制。

《续护生画集》(即第二集)初版于1940年11月,出版者同样是开明书店,封面由丰子恺设计,弘一法师题签,封底为英文书名。目前“日月楼”还保存着第二集的初版。续集的书画稿也曾遗失,所幸后来被丰子恺的私淑弟子朱南田在书摊上觅得,变卖家中沙发凑

钱买回。

1950年2月,《护生画三集》由大法轮书局发行,小32开平装,由于当时弘一法师已过世,所以封面设计和题签均由丰子恺完成。到了1960年左右,国内出版护生画已有困难,因此《护生画四集》由新加坡广洽法师集资刊印3000册,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。版权页上没有写明出版时间,序言时间为1960年农历9月。《护生画五集》原本应该在1970年出版,但丰子恺担心时局,提前绘成90幅,请虞愚题字,用弘一法师字体作题签,1965年9月由广洽法师所在的蕙蓀院出版。然而从新加坡运回的《护生画五集》不久后在“文革”中被付之一炬,焚书处就在“日月楼”二楼房间门前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,丰子恺被定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而受到批斗,《护生画集》也被查禁,还剩下最后一

集没画。丰一吟说:“他可能预感到自己活不到1980年,所以从1973年就开始画第六集。”那时丰子恺的起居室设在“日月楼”二楼的阳台,阳台上的一张床小得无法伸直双腿躺下。为了不影家人,也因为怕被发现连累家人,他利用每天天亮前和天黑后的时间拼命画,最后提前5年完成了第六集。丰子恺的家人特别提到了护生画集的“恩人”朱幼兰:“‘文革’期间书都被抄家抄走了,找不到绘画的素材,朱幼兰冒着政治风险找到《动物鉴》为他提供画材,当时没人敢为画集写书稿,他也自告奋勇,说我是信佛的,我不写谁写。写完以后,也一直放在他家里。”1978年,广洽法师回到大陆,从朱幼兰处将保存完好的原稿带走,当年10月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,并同时发行了第一至第五集的再版,封面装帧仍沿用荷花老版本。可惜丰子恺已于1975年9月15日逝世,未能见到第六集出版。

1985年,广洽法师将原稿全部捐给了浙江省博物馆,它们终于不再颠沛流离。不过由于这些书画此后一直“隐居”在杭州,所以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护生画全集、选编,都是以1978年的书稿而不是原稿为依据的。



各个版本的《护生画集》封面